

## 独辟蹊径再现“广州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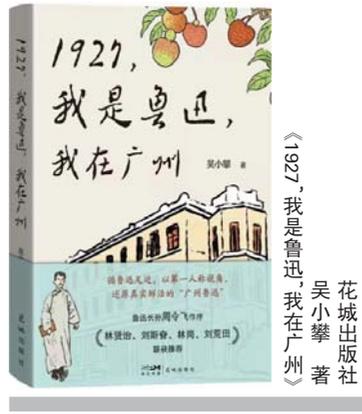
□李怀宇

关于鲁迅的研究如同“月印万川”。对“月”而言，任何一条河川，只是千万条河川之一；对万川而言，“月”则只有一轮。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轮“明月”，月印万川。而最新出版的《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又是另一条独辟蹊径的河流，河道九曲，滔滔汨汨，再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广州鲁迅”。如此以第一人称写鲁迅十分罕见，作者借由鲁迅的内心独白，重寻1927年鲁迅在粤行踪，既是一段文学史，也是一段心灵史。

《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中的语言，完全是一副“鲁迅腔”。一位带着绍兴口音的中年人，来到羊城，见证烟火，快意情仇：“总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我爱广州。不仅仅是因为广平，而是这里弥漫着的那种真实的生活本身让我感动，没有虚假的高调的演说，也许有，但与百姓无关，他们在享受着日常生活本身。”这分明是一位“恋爱中的中年人”的爱屋及乌，因为爱“广平兄”而及广州。

当然，这位中年人是名人，来了广州也享受着名人的苦恼。书中的鲁迅颇有自知之明：“我是‘名人’了，名人就是一种摆设，大家小心地供着，供品是供完就拿回家自己吃的，不灵验了心里还要骂菩萨。”这正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今时今日的明星们，不正在重演着一出如此大戏这般小戏？

在广州，鲁迅如同今天的网红，到处吃喝游逛，打卡羊城胜景。他和许广平、廖立峨游越秀山，到了山上，登上镇海楼，凭栏远眺广州城，密密匝匝，红墙褐瓦掩映在木棉绿荫丛中，可见炊烟袅袅，可闻鸡鸣狗吠之



声。微风吹拂，心旷神怡。鲁迅“瞥见广平脸颊微红，气息微喘，我把手帕递过去，她瞥了一眼一旁的廖立峨，脸兀自更红了”。结果，鲁老夫子聊发少年狂，一不小心，把脚崴了。这一段，放在今天，绝对可以上热播。这真是绝好的广州城市宣传片素材。

鲁迅在许广平等人的陪同下到香港演讲。鲁迅说：“到了香港，我反而觉得这里有别处的中国所没有的平静，名为‘维多利亚’的港张扬的更多是西式的高桅尖嘴大船，在雨中摇橹辛劳的是褐衣船工或背着孩子的船娘，岸边或更远的山上矗立着许多欧陆别墅。”他又怀疑自己半咸半淡的官话演讲在香港人听来会不会如广东话所说的“鸡同鸭讲”。两场演讲，一为《无声的中国》，一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今天听起来，并未过时：“中国旧文化的老调子就是一把软刀子。中国的读书人就应该从洋房、卧室、书房踱出来，看看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后来，鲁迅从文明路中山大学的

年人的心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白云楼变得热闹起来，各种人物都来走访，我又成了动物园里的奇怪动物，人们免票参观，我义务表演：或者僵硬的笑，或者淡漠的表情，或者无聊的言语，或者望向空中的眼神。只有夜里灯下给远方朋友写信，才有那么一些真实和沉静。”这一段心理独白，惟妙惟肖，有如亲见。

“文字世界尚可慰我怀”，书中的鲁迅说。事实上，爱情更可慰他老人家的情怀。情感高潮在许寿裳离穗北上后出现：“有一天，夜里，仍是两个人的时候，南方的夜如此沉静，连不远处珠江的水声也似乎都能听得见。我坐在桌前灯下看书写字，她走到我的身边，并不说话。突然，她握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太多激动，似乎早就握过，自然而然。我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她竟然比我更有力量。‘你战胜了我！’——自然，也是我甘于做她的俘虏。”这一刻，“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变得柔情缱绻：“这是我人生的顶峰，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里。”

给《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补一个脚注：鲁迅的爱人许广平，祖籍广东澄海。清嘉庆年间，澄海县岐山乡沟南许氏第十六世孙许拜庭到番禺做珠宝生意，发迹后在现今广州市北京路高第街的许地置家立业。到道光年间，广州许地的许应骥高中进士，后曾任闽浙总督，辖下便有鲁迅的故乡绍兴。前生今世的情缘，算起来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许广平随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后，每逢春节，总要说几句潮州话，做几道潮州菜，以慰故乡之思。

（作者为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 在风险中开辟生路

□乐倚萍

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是否打疫苗仍然不是全然依赖理性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将“疫苗犹豫症”列为世界十大健康威胁之一，足见个体选择的不确定性。那么在300年前，打疫苗还是个新事物，它又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呢？英国作家露丝·沃德的《来自英国的冬宫御医：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天花》一书，或可给我们一些启发。

书名让答案昭然若揭：当时人们谈之色变的天花疫情一定是疫苗普及的催化剂。毕竟，天花的传染性极强，致死、致残率高，而且感染者不分尊卑，当时欧洲几个国家的御医都束手无策。

最先问世的是人痘疫苗，欧洲人对它并不信任。人痘接种据信源自中国：刺破患者的脓疱，取其脓液涂抹于健康人的创口，被接种者会出现轻微天花症状，其后能避免自然感染可能造成的更致命的影响。不过人痘接种也不是毫无风险的，操作不当会危及生命，加之人们对其中原理一无所知，对这种口耳相传之法保持观望是人之常情。

改变公众认知，首先得靠实证。威尔士亲王妃卡罗琳支持了两项实验，分别给死刑犯中的志愿者和孤儿院儿童接种人痘，验证他们能否经受真正的天花感染，答案是肯定的。

其次靠数据。英国医生托马斯·内特尔顿在1722年发表了对人痘安全性的分析，这是已知首次在治疗手段效用评估领域应用量化方法。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詹姆斯·朱林和他的继任者则广泛收集数据、

整理年度报告，他们指出，人痘接种的整体致死率小于五十分之一，天花的自然感染致死率则要高于六分之一。但生命不能用冰冷的数字来衡量，即使风险再小，近在眼前的风险也比遥远的、不确定的风险更易对人产生影响，主动选择风险需要极大勇气，更多的父母竭尽全力保护孩子远离任何风险。

积极汲取西方前沿科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通过接种保护自己的子女免受天花威胁，她更想亲自来证明接种的安全性，从而在俄国推行。相较于利用强权去普及，女皇的侧重点是树立公众的信心，所以，当她请来的英国医生托马斯·迪姆斯代尔谨慎地提议先在贫妇身上试一下，女皇拒绝了；接种后，她努力以良好的状态示人，在出现接种反应的几天也不例外，她必须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以杜绝人们对接种的猜疑；她甚至还想提供自己接种后的脓液给儿子接种，此举无疑更有宣传效果，可惜儿子因病错过了时机。作为欧洲第一位接受人痘接种的在位君主，女皇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明、支持发展的人设。此后，她还计划加强全民医疗建设，减少对外国医生的依赖，并在帝国范围内增设实验室和药店。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托马斯医生不只是个娴熟的接种医生，在推行人痘接种方面，他跟女王的理念非常合拍。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则逸事：托马斯从一个贫穷的孩子身上采集脓液，孩子的父母是迫于皇命才就范的，他们心里怀着普通老百姓中广泛存在的迷信，认为贡献脓液会导致死亡。托马斯意识到，如果这个孩子死了，将会加深公众偏见。患儿的父母不懂医学，他们不仅带他去澡堂洗澡，还紧闭门窗，险些真的让患儿丧命。幸而托马斯及时干预，给患儿开了含有奎宁的秘鲁树皮，坚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挽救了患儿，亦遏止了潜在的舆论。

在作者露丝·沃德看来，人痘接种普及的故事是后来包括牛痘在内的其他疫苗推广的先声。这不仅是一部特定疫苗的史诗，还有与之相伴的医疗技术进步、传染病、体内感染过程、比较病理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知识，科学发现与社会活动联姻，公共卫生成为政治议题，医学调研和数据应用……在社会群体中，“健康的个体主动感染疾病以免受更大风险的原则已被确立”。在来势汹汹的疾病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但我们一直在设法从风险中开辟生路。

（作者为上海海关工作人员）



《来自英国的冬宫御医：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天花》  
[英]露丝·沃德 著  
姜晓颀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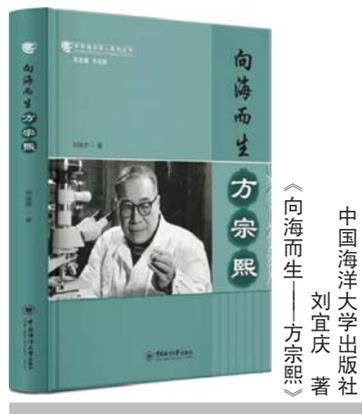
## 敢立潮头唱大风

□崔均鸣

不久前，认真地阅读了刘宜庆的传记文学新作《向海而生——方宗熙》。宏阔的历史背景，清澈的人物细节，自民国元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主方宗熙的生命历程得以生动呈现。可以说，方宗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在新旧时代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有坚守，也有妥协，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进退之间，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学人本色始终不变。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向海而生”也许是方先生的宿命；而与方先生相伴相随的中国往事，则是华夏大地上“向阳而生”的蝶变过程。其间，苦难与辉煌，失败与成功，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位海洋学人在历史大潮面前，勇立潮头，直面风浪的品性栩栩如生。

方宗熙出生于1912年4月。其家境贫寒，树立凌霄之志；厦大八年，投身生物研究；战乱期间，远避南洋教书；抗战胜利后，远赴英国深造。当新中国成立后，他历经曲折回到祖国。1953年，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童第周邀请他到该校生物系任教。方先生为之心动，毕竟这是他多年追求的专业方向和科研夙愿。于是，他携妻将女来到青岛，开启了在青岛长达三十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1953年4月至1959年4月，方宗熙在山大生物系执教。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带领科研团队培育出了海带新品种“海青一号”“海青二号”以及“单杂十号”优良海带。

作为中国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



种学奠基人，方宗熙的科研多是开创性的，以海洋藻类的遗传和育种研究蜚声国际。除了致力于海带等大型褐藻的遗传育种研究之外，他还积极推动我国其他海洋藻类和植物的研究工作，在海洋类资源的保存与利用、大型藻组织培养与再生植株等方面颇有建树，在他的指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海藻（海带、裙带菜）种质资源库和中国第一座海洋微藻种质库，奠定了我国在国际海洋植物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向海而生——方宗熙》的作者刘宜庆是一位在传记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知名作家。在其出版的数十本著作中，人文领域涉猎较多。近几年，他开始向海洋科学领域延伸。这不仅需要娴熟的文学功底，还得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储备。在关乎海洋知识方面，他经受住了“内行”的严苛审视。与此同时，他能够从从容地突破专业术

语的表达樊篱，以简捷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传神地描述了一位科学家的科研成就和生活状态。

不动声色的细节叙说，往往更具震撼力。1982年，方宗熙出访加拿大回国后，“把节约的生活费270元8角5分全部上交给了教育部”。随后，由方宗熙领导的三人小组赴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访问考察，为期约一个月，他们省吃俭用，“只花了1000余美元，剩下的6000多美元他们购买了60多种仪器和用具，将剩下的800余美元上缴给了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的小儿子方明明在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入读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毕业分配时，他希望能留校工作，因为他功课最好。虽然此时方宗熙已是山东海洋学院的副院长，但方明明的分配志愿最终未能实现。这不仅彰显了方宗熙的博大胸襟，也映照出当年山东海洋学院那股清正廉洁、公平无私的学术风气。

1984年9月我考入山东海洋学院水产学院水产养殖系。方宗熙编著的《动物学》《植物学》《普通遗传学》是我当年必读的基础教材。在鱼山路5号的校园内，我也曾与衣着简朴的方先生擦肩而过。虽然，我与他没有单独交往，但关于他的传说却听说过许多。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黄金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科学报国的梦想。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社会的公平从不怀疑。

行文至此，禁不住感慨万千。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方宗熙先生身后的莘莘学子啊。面朝大海，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